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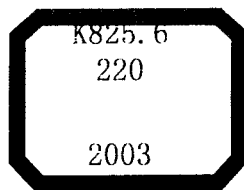
浙大学术精品文丛

王禹偁事迹 著作编年

◎ 徐 规 著



商務印書館



K825.6
220

浙大学术精品文丛

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

徐 规 著

商务印书馆

2003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徐规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

(浙大学术精品文丛)

ISBN 7-100-03780-8

I. 王… II. 徐… III. 王禹偁(954~1000) — 年
谱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 第 024678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

徐 规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ISBN 7-100-03780-8/K·767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开本 890 × 1240 1/32

2003 年 4 月上海第 1 次印刷 印张 8 1/4

定价: 16.00 元

《浙大学术精品文丛》总序

近代以降,西学东渐,接受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成为开明人士的共识。杭州知府林启(1839—1900)会同浙江巡抚和地方士绅,积极筹备开设一所以西方科学体系为主要课程的新型学堂。经清廷批复,求是书院于1897年3月在杭州设立(1901年改为浙江大学堂)。这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几所新型高等学府之一。

求是书院几经变迁,到1928年,成为国立浙江大学。1936年,杰出的气象学家和教育家竺可桢(1890—1974)出任校长,广揽英才,锐意改革,很快使浙江大学实力大增,名满东南。抗日战争期间,全校师生在竺可桢校长的率领下,艰苦跋涉,举校西迁,在贵州遵义、湄潭办学,一时名师云集,被英国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誉为“东方剑桥”。

浙江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名家辈出。1928年,浙大正式设立文理学院,开设中国语文、外国语文、哲学、心理、史学与政治等学科。1934年增设史地学系,1939年,文理学院分为文学院、理学院,1945年成立法学院,后又陆续增加哲学系、人类学系、经济学系等系科和一批文科类研究所。与求是书院同年创建的杭州育英书院,1914年成为之江大学。陈独秀、蔡元培、陈望道、胡适、蒋梦麟、马叙伦、马一浮、郁达夫、夏衍、吴晗、胡乔木、施蛰存、郭绍虞、林汉达、经亨颐、汤用彤、谭其骧、劳乃宣、邵裴子、宋恕、蒋方震、许寿裳、沈尹默、邵飘萍、梅光迪、钱穆、

马寅初、张荫麟、张其昀、贺昌群、钱基博、张相、夏承焘、姜亮夫、朱生豪、王季思、严群、许国璋、王佐良、薄冰、方重、裘克安、戚叔含、李浩培、孟宪承、郑晓沧等著名学者曾在这两所学校学习或任教。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浙江大学一度变为以工科为主的高等学府。它的文学院和理学院的一部分,与之江大学文学院、理学院合并成为浙江师范学院,后演变为杭州大学。它的农学院和医学院则分别发展为浙江农业大学和浙江医科大学。1998年9月,同根同源的原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合并成为新的浙江大学,这是新时期中国高校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新浙大是目前国内学科门类最齐全、规模最大的研究型综合性大学之一。

新浙江大学成立后,人文社会科学得到了更大、更好的发展机遇。目前,浙江大学拥有文学、哲学、历史学、语言学、政治学、艺术学、教育学、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全部一级学科,门类齐全,实力雄厚。而在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学科交叉和相互渗透方面,浙江大学更具有明显优势。为了有力推动浙江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新世纪之初,学校确立了“强所、精品、名师”的文科发展战略,从机构、成果、队伍三方面加强建设,齐头并进。《浙大学术精品文丛》就是这一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共同构成了人类的知识系统,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历史与未来,社会与人生,中国与世界,旧学与新知,继承与创新……,时代前进和社会发展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趋势下,人文社会科学的地位和重要性正日益凸现,每一个有责任感的

学者,必将以独立的思考,来回应社会、时代提出的问题。编辑这套《浙江大学学术精品文丛》,正是为了记录探索的轨迹,采撷思想的花朵。

浙江素称文化之邦,人文荟萃,学脉绵长。自东汉以来,先后出现过王充、王羲之、沈括、陈亮、叶适、王守仁、黄宗羲、章学诚、龚自珍、章太炎、鲁迅等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科学家,南宋后更形成了“浙江学派”,具有富于批判精神、实事求是、敢于创新的鲜明学术传统。浙江大学得地灵人杰之利,在百年发展史上集聚和培育了大量优秀人才,也形成了自己“求是创新”的优良学风。《浙江大学学术精品文库》将以探索真理、关注社会历史人生为宗旨,继承优良传统,倡导开拓创新的精神,力求新知趋邃密,旧学转深沉。既推崇具有前瞻性的理论创新之作,也欢迎沉潜精严的专题研究著作,鼓励不同领域、不同学派、不同风格的学术研究工作的同生共存,融会交叉,以推进人文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

《浙大学术精品文丛》是一套开放式的丛书,主要收纳浙江大学学者独立或为主撰写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著作。为了反映浙大优良的学术传统,做好学术积累,本丛书出版之初将适当收入一些早年出版、在学界已有定评的优秀著作,但更多的位置将留给研究新著。为保证学术质量,凡收入本丛书者,都经过校内外同行专家的匿名评审。“精品”是我们倡导的方针和努力的目标,是否名实相符,真诚期待学界的检阅和评判。

同样诞生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向以文化积累和学术建设为己任,盛期曾步入世界出版业的前列,而今仍是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学术出版重镇。浙江大学和商务印书馆的合作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1934年,商务印书馆就出版过《国立浙江大学丛书》。值

得一提的是,浙大历史上有两位重要人物曾在商务印书馆任职。一是高梦旦(1870—1936),他1901年任刚刚更名的浙江大学堂总教习,次年以留学监督身份率留学生赴日本考察学习。1903年冬他应张元济之邀到商务,与商务共命运达三十余年,曾任编译所国文部部长、编译所所长,主持编写《最新教科书》,倡议成立辞典部,创意编纂《新词典》和《辞源》,为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一是老校长竺可桢,他1925—1926年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史地部主持工作,参加了百科词典的编写。在浙江大学努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今天,百年浙大和百年商务二度携手,再续前缘,合作出版《浙江大学学术精品文丛》,集中展示浙大学人的研究成果。薪火相继,学林重光,愿这套文丛伴随新世纪的脚步,不断迈向新的高度!

目 录

序	1
编年	13
参考书目	219
附:《全宋文·王禹偁》补正	227

序

王禹偁(954—1001),字元之,济州巨野(今山东巨野)人,出身“磨家儿”^①,官至翰林学士。他是北宋政治改革派的先驱,是关心民瘼、敢说敢为的好官,是诗文革新的旗手,是据实直书、不畏时忌的史家。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这样的士大夫真是凤毛麟角,少有其匹的。

(一)

王禹偁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考取进士,开始走上仕途。这时候,北宋政府已经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立局面,中央集权势力终于战胜了地方割据势力。从宋太宗两次伐辽失败之后,契丹军队常常南下掠夺;西北的党项贵族时叛时降,并与契丹结成犄角之势,共同对付北宋,民族矛盾相当尖锐。同时,阶级矛盾也趋向激化,农民起义相继出现。旧的法制已难以适应新的形势。为此,北宋统治集团内部不断有人提出变法的主张,王禹偁就是其中一位杰出的代表。

端拱元年(988),宋太宗下诏求直言。当时王禹偁初拜右拾遗

^① 毕仲游《西台集》卷十六《丞相文简公(毕士安)行状》。“磨家”是指以磨麦制面为生的贫苦人家。

(谏官)、直史馆(史官),先后奏上《端拱箴》与《三谏书序》。在《箴》中,请求重视农业生产,节约财政开支,任用贤能官吏,抑制豪强兼并。王禹偁切直地向太宗提出忠告:“无侈乘舆,无奢宫宇,当念贫民,室无环堵。无崇台榭,无广陂池,当念流民,地无立锥。”又说:“勿谓丰财,经费不节,须知府库,聚民膏血。勿谓强兵,征伐不息,须知干戈,害民稼穡。”最后,建议“计口授田,兼并何有,是谓仁政,及于黔首。约人署吏,侵渔则少,是谓能官,惠于无告”。^① 在《序》中,主张端飭士行,沙汰僧尼,并省官吏。^②

就在这一年的十一月,契丹骑兵又南下攻掠;次年正月,契丹进陷易州(今河北易县),边境危急。宋太宗下诏群臣命各陈备边御戎之策,王禹偁又上《御戎十策》,再次提出变法主张,并警告说:若不进行改革,“则寇不独在外而在乎内也”。这个奏策深得当时名相赵普(922—992)的赞赏。^③

至道三年(997),太宗病死,真宗即位,下诏求直言。王禹偁那时担任知扬州事,应诏上疏,要求真宗“治之惟新,救之在速”,并提出五项政治改革主张。一是“谨边防,通盟好,使辇运之民有所休息”;二是“减冗兵,并冗吏,使山泽之饶稍流于下”;三是“艰难选举,使入官不滥”;四是“沙汰僧尼,使疲民无耗”;五是“亲大臣,远小人,使忠良谗谀之士知进而不疑,奸佞倾巧之徒知退而有惧”。^④ 这个奏疏是王禹偁平生最重要的政论,最足以代表其政治思想。

① 王禹偁《小畜外集》卷十。

② 王禹偁《小畜集》卷十九。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以下简称《长编》;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三引宋敏求撰《王禹偁神道碑》。

④ 吕祖谦《皇朝文鉴》卷四二。

奏疏上达后，王禹偁被召回朝，第三次担任知制诰，替皇帝起草诏令。

咸平元年(998)的岁除日，王禹偁被排斥，出知黄州(今湖北黄冈)。由于各地不断爆发农民起义和士兵暴动，王禹偁在咸平三年又上疏言事，大胆地指出太祖、太宗推行的中央集权措施，“虽则尊京师而抑郡县，为强干弱枝之术，亦非得其中道”；迫切要求真宗“改辙更张，因时立法”；呼吁加强各郡县的地方武装力量。^①

王禹偁具备了“少苦寒贱，又尝为州县官，人间利病亦粗知之”^②的条件，面临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局势，他站在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立场上，提出了一系列的变法主张和具体措施，希望对国计民生有所裨补。可是他的主要建议与宋初实行“不抑兼并”、“不立田制”以及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策相违背，当然不会被宋太宗、宋真宗所采纳。后来，宋仁宗时，范仲淹(989—1052)等人进行的“庆历变法”(1043—1044)，其基本内容还是王禹偁所提出的那些办法。王禹偁不愧为北宋政治改革派的先驱。

(二)

王禹偁关心民众疾苦，遇事敢说敢为。太宗雍熙二年(985)，王禹偁任苏州长洲知县时，就在给上级长官的书信中，陈述苏州地区赋税特别苛重，“无名之租息，比诸江北，其弊犹多”，要求减免当

^① 《长编》卷四七，《宋史纪事本末》卷十六。

^② 《小畜集》卷十八(上太保侍中(赵普)书)。

地民户的酒税负担，“今若又以榷酒之数，益编户之赋，何异负重致远者未有息肩之地而更加石焉，何以堪之，谅阁下必不尔为！”^①雍熙四年，他又在《为长洲令自叙》一文中诉说长洲县“土甚瘠而民不懈，吏好欺而赋愈重”，清廉正直的官吏难以立脚，“廉其身而浊者忌之，直其气而曲者恶之”。并谈到上一年，该县境内稻禾歉收，政府催税，急如星火，人民挨饥饿而受鞭打的，“日不下数百辈，菜色在面而血流于肤”。禹偁目睹这种惨状，“因出吏部考课历，纳质于巨商”，得钱一万七千贯，买来白米代替贫民输纳，准许他们在下一年陆续归还。^②

王禹偁在知黄州任内，看到监狱里的犯人，“每有患时疾者，互相浸染，或致死亡”，就向朝廷建议：在各路设置病囚院，“持仗劫贼，徒、流以上有疾者”即留病牢中将养治疗，其他各类罪犯都允许具保出外医治。咸平四年（1001），这个人道的建议被北宋政府所采纳。^③

端拱元年（988）十二月，王禹偁在京城任谏官、史官，撰写《对雪》诗一篇，记述当时农民和士兵的苦难境况说：

因思河朔民，输税供边鄙，车重数十斛，路遥几百里，羸蹄冻不行，死辙冰难曳，夜来何处宿，阒寂荒陂里！

又思边塞兵，荷戈御胡骑，城上卓旌旗，楼中望烽燧，弓劲添气力，甲寒侵骨髓，今日何处行，牢落穷沙际！

接着，又针砭自身说：

自忘亦何人，偷安得如是！深为苍生蠹，仍尸谏官位。睿

① 《小畜集》卷十八〈上许殿丞论榷酒书〉。

② 明代钱穀《吴郡文粹续集补遗》著录。

③ 《宋会要辑稿》刑法六之五二，《长编》卷四八。

谓无一言，岂得为直士？褒贬无一词，岂得为良史？不耕一亩田，不持一只矢；多惭富人术，且乏安边议。空作对雪吟，勤勤谢知己。^①

王禹偁谪官州郡多年，比较接近下层，对人民的疾苦和群众的力量逐步有所了解。他于淳化五年(994)写的《送毋殿丞赴任齐州》诗中，有“三齐号难治，民瘼待良医。勿谓人多诈，须教吏不欺”之句。^②可见他对官吏与人民相互关系的认识，显然有别于一般士大夫。至道二年(996)，王禹偁于贬官滁州(今安徽滁县)任内撰的《唱山歌》诗中，描绘当地人民特别是青年男女在新春佳节盛行歌舞晚会，有“男女互相调，其词非奔淫。修教不易俗，吾亦弗之禁”，“乃知国家事，成败因人心”等句子。^③这种顺民俗、因人心的思想，不仅在诗中充分表达出来，而且在他一生的政治生活上也是有所反映的。

王禹偁不畏权势，不计个人利害，是当时著名的刚直之士。他在初任谏官兼知制诰期间，由于直言敢谏，“兼磨断佞剑，拟树直言旗”，再加撰写制诰的词句，多不虚饰，因此遭到权臣和一些同僚的憎恶。^④淳化二年，富有权势的尼姑道安诬陷著名学者徐铉(917—992)与妻甥姜氏通奸，姜氏是道安的嫂子。这时王禹偁判大理寺事，他执法为徐铉雪诬，抗疏论道安告奸不实罪，被贬为商州(今陕西商县)团练副使，不得签书公事。^⑤因俸禄微薄，租典园圃

① 《小畜集》卷四。

② 《小畜集》卷十。

③ 《小畜集》卷五。

④ 《小畜集》卷八〈谪居感事〉。

⑤ 《宋史·王禹偁传》，《宋史·徐铉传》，《宋史·张去华传》，《皇朝文鉴》卷四二〈应诏言事疏〉；参阅清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卷七一。

来种菜自给。^①这是王禹偁第一次受到贬官的打击。

至道元年,王禹偁在担任翰林学士的一百天内,“制敕有不便,多所论奏”。又因宋太祖的皇后宋氏之丧,群臣不成服,禹偁有所议论,触犯太宗忌讳,坐“轻肆”的罪名,罢为知滁州事。^②这是王禹偁第二次受到贬官的打击。至道三年,他在给刚即位的真宗的表文中谈到自己两度被贬谪是由于“虚名既高,忌才者众。直道难进,黜官亦多”。又说:“始贬商於,实因执法。后出滁上,莫知罪名。”^③可见他对于皇帝和权臣的威势,也没有丝毫的畏惧和退缩。

至道二年,王禹偁在滁州期间,太子中允、福建路转运使丁谓(966—1037)来书,认为禹偁的贬官是由于秉性“高亢刚直”所招致,规劝他要改变作风。禹偁在复书中陈述自己生平志趣,认为丁谓的说法是“以成败为是非,以炎凉为去就者说之云”;并坦率地指出丁谓“第一进士,得一中允,而欲与世浮沉,自堕于名节,窃为谓之〔丁谓字〕不取也”。^④禹偁即使处于逆境时,仍坚持自己平素操守不变;而丁谓未能听从禹偁的忠告,后来终于走上趋炎附势、取媚当朝的邪道。次年,王禹偁又在给朋友晁迥(951—1034)的回信中,对当日官场情况与自身性格、遭遇,慨乎言之:“某褊狃刚直,为众所知,虽强损之,未能尽去。夫今之领藩服、当冲要者,必先丰厨传以啖人口,勤迎劳以悦人心,无是二者,虽龚、黄无善誉矣。某皆

① 《小畜集》卷九〈自咏〉,〈种菜了雨下〉,〈偶置小园,因题二首〉之一。

② 〈长编〉卷三七,〈宋会要辑稿〉后妃一之一,《小畜集》卷五〈北楼感事〉诗序,《宋史·王禹偁传》,《宋大诏令集》卷二〇三。

③ 《小畜集》卷二二〈谢转刑部郎中表〉。

④ 《小畜集》卷十八〈答丁谓书〉。

不能也，惟官谤是待”。^①咸平二年(999)，王禹偁贬官到黄州去，这是第三次受到贬官的打击，当时他曾寄诗给宰相李沆(947—1004)，其中有“贫有妻贤须薄禄，老无田宅可归耕。未甘便葬江鱼腹，敢向台阶请罪名”之句；^②又作《三黜赋》以明志，说自己“屈于身兮不屈其道，任百谪而何亏！吾当守正直兮佩仁义，期终身以行之”。^③他的倔强性格和百折不挠精神，跃于纸上。节操凜然，令人敬佩！

(三)

王禹偁有鉴于唐末五代以来的颓靡纤丽文风，早在宋太宗淳化元年(990)所撰《送孙何序》及淳化三年的《五哀诗》中提出了改革意见。^④至道元年(995)，他在写给张扶的两封回信中，详细陈述自己的文学理论。他首倡文以传道而明心之说，主张文句必须通俗易懂——“句易道，义易晓”。^⑤禹偁平生最推崇韩愈的古文，而韩愈论文章，原有“怪怪奇奇”、“佶屈聱牙”与“文从字顺”、“惟师是”两种说法。禹偁取其后者，在自身创作实践上，确能贯彻始终，因此他的作品不仅思想性和艺术性较强，而且语言也流畅明白。就他对宋代古文的影响来说，不愧是欧阳修(1007—1072)等人的

① 《小畜集》卷十八〈答晁礼丞书〉。龚遂、黄霸是西汉时的循吏，见《汉书》卷八九〈循吏传〉。

② 《小畜外集》卷七〈出守黄州上史馆相公〉。

③ 《小畜集》卷一。

④ 《小畜集》卷十九，卷四。

⑤ 《小畜集》卷十八。道是指政治主张、道德准则、哲学观点等等，心是指作家个人的精神世界和思想感情。

先导。其最著名的代表作有《待漏院记》、《黄州新建小竹楼记》^①、《唐河店姬传》、《录海人书》^②以及《答张扶书》等篇。《录海人书》是一篇寓言，与晋代陶渊明《桃花源记》具有同样的理想，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里小农的要求。《答张扶书》堪称直追韩愈的典型作品。

近人章士钊说：“宋初，先于穆伯长而以开古文涂径自豪者，柳姓名开，字仲涂，其文之不从，字不顺，臃肿滞涩，几使人读之上口不得。”^③柳开(947—1000)和王禹偁同为宋初古文运动的先导，但柳开在文学上的建树是比王禹偁逊色的。

王禹偁以诗歌驰名当世，北宋大诗人林逋(和靖，968—1028)对他的诗歌极为钦佩，曾有“纵横吾宋是黄州”之句。^④禹偁晚年谪官黄州，后人敬称他为“王黄州”。他平生爱读杜甫、白居易的作品，推尊杜甫开辟“诗世界”的功绩，可谓独具只眼。他实践白居易“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开宋诗革新的先声。他在端拱元年写的《对雪》诗，淳化三年的《感流亡》、《竹籬》诗以及四年的《对雪示嘉祐》歌行，不独勇于揭示现实，而且严于针砭自身，继承和发扬了杜甫《三吏》、《三别》与白居易的《秦中吟》、《新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求之宋人诗集中，是很少见到的。

禹偁的诗，写景抒情，引人入胜。如淳化三年八月在商州创作

① 《小畜集》卷十六，卷十七。前者作于太宗雍熙四年冬，后者作于真宗咸平二年秋。

② 《小畜集》卷十四。《传》作于端拱二年或淳化初，《书》是在直史馆时作，至迟不晚于淳化二年。

③ 《柳文指要》下册卷八〈宋初古文〉条。穆修，字伯长。章士钊在论〈宋初古文〉条没有提到王禹偁。

④ 《林和靖诗集》卷三〈读王黄州诗集〉。

的《村行》诗：

马穿山径菊初黄，信马悠悠野兴长。

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

棠梨叶落胭脂色，荞麦花开白雪香。

何事吟馀忽惆怅，村桥原树似吾乡。^①

又他在淳化二年冬末写的《畚田词》七绝五首，着意描绘商州农村生活，歌颂山区人民“更互力田”的良好习俗，语调平易，别树风格。^②王禹偁确为北宋诗文革新的旗手。

王禹偁不但长于文学，而且史学造诣亦深。早年在担任史官期间，曾编纂端拱元年春季《日历》一书。^③咸平元年，又以知制诰的身份参预重修《太祖实录》，因据实直书，不畏时忌，被谪官黄州。接着，撰成《五代史阙文》一卷，自序云：“臣读五代史总三百六十卷，记五十三年行事，其书固亦多矣。然自梁至周，君臣事迹传于人口而不载史笔者，往往有之。或史氏避嫌，或简牒漏略，不有纪述，渐成泯灭，善恶鉴戒，岂不废乎？因补一十七篇，集为一卷，皆闻于耆旧者也。”^④清初王士禛（1634—1711）《香祖笔记》称赞此书“辨证精严，足正史官之谬”。《新五代史》多采取其文字，《新唐书·司空图传》亦全用其论辨，“虽篇帙寥寥，当时固以信史视之矣”。^⑤

① 《小畜集》卷九。

② 诗见《小畜集》卷八。

③ 《小畜集》卷二〈请撰大行皇帝实录表〉。日历为编年体史书之一种，根据时政记、起居注编成。

④ 撰成时间，据《五代史阙文》卷末〈王朴〉条考定，应在咸平二年六月宰相李沆等上《重修太祖实录》之后。

⑤ 《四库全书总目》卷五一〈史部·杂史类·五代史阙文〉条。